

在华国际移民的多样化特征与韧性治理策略

陈凤兰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国际移民流入呈现多样化特征:来源地多样化,以周边国家为主;迁移动机多样化,来华就业居首位;空间分布多样化,呈多点扩散;非法移民滞留多样化,部分隐匿于城乡家庭。国际移民多样化可能引发潜在社会风险,如移民小社会的形成引发文化冲突风险,非法移民导致公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信任的下降风险,跨国婚姻移民引发婚姻不稳定性以及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应当构建一个兼具系统性与灵活性的韧性移民治理体系,以减少国际移民流入所带来的风险影响范围和冲击力,推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升我国在国际移民治理方面的能力,实现多方共赢。

关键词:国际移民;移民多样化;社会风险;韧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25)02-0138-10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国际移民,是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①。本文所指的在华国际移民,是指以外籍移民身份来中国居住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国际移民流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国际移民在中国的入境、居住和就业人数持续增长。199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③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数量达到84.57万人。^④国际移民的增长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拉力”的结果。然而,随着在华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国际移民呈现多样化趋势。作为一个非传统移民接收国,中国在国际移民治理方面的历史经验相对有限,制度尚未完善,面临着“合法移民难以融入社会,非法移民数量持续增加”的挑战。

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现有统计数据对在华国际移民发展历史与动态进行梳理。段成荣和邱玉鼎对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

收稿日期:2025-0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南亚移民在华的社会空间特征及其治理策略研究”(20BSH090)

作者简介:陈凤兰,女,福建泉州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flchen@fzu.edu.cn。

①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Castles Stephen,“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8, no.3(2004), pp.852-884.

③ 庞丽华:《国际人口迁移的概念和测量——兼论中国国际人口迁移趋势》,《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1期。

④ 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2020年6月10日。

情况进行纵向分析^①;刘云刚和陈跃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动态特征^②;宋全成和熊方洲基于六普与七普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③。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来华国际移民的增加与变化,将对中国的国际移民治理带来机遇与挑战。如英国学者彭柯认为,中国将迎来更多的国际移民,这对我国社会具有一定的挑战。^④

第二类是针对特定地区和特定类型的国际移民进行适应模式和社会影响的个案研究。在北京望京的“韩国城”中居住的韩裔移民身份多样、结构复杂,主要有企业职员、个体商人和留学生。^⑤望京的韩国人跟当地的居民有社会互动,但无论是思想观念或是行为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⑥聚集在上海的日本人在古北形成了族裔聚居区,他们在生活方面依靠族裔经济的供给,与当地社会交往较少,有一定的封闭性。^⑦广州聚集了较多的非洲移民,形成了非洲商人在广州的族裔经济区。^⑧但大部分非洲商人在华的社会适应水平不高,他们重视的是在华的生意,并不关心是否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同。^⑨此外,学界对来自东南亚的劳工移民、跨国婚姻移民也有较多的研究,但无论是劳工还是跨国婚姻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社会融合程度均比较有限。^⑩

总体而言,国内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研究数量日益增多,大部分研究或是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来描绘国际移民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纵向发展趋势,或是聚焦特定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微观层面的探讨,相关的治理措施则主要集中在“三非移民”群体上。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来到中国,国际移民的来源地、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已有显著的转变。这些变化导致的社会风险和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展,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关注相对分散,对国际移民流入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分析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以更加综合、细致的角度去分析在华移民群体的多样化新特征及潜在的社会风险生成逻辑,探索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不仅有利于移民研究的理论积累,而且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也显得尤为迫切。

因此,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移民来华的动机是什么?在华国际移民呈现哪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会引发哪些潜在社会风险?中国应采取何种治理策略来应对这些风险与挑战?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将简要回顾1949年以来国际移民来华的历史脉络,重点探讨1990年以来国际移民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案例,分析国际移民多样性潜在社会风险的形成逻辑和表现形式;接着,尝试将韧性治理概念引入国际移民治理领域,阐释国际移民韧性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和政策含义,并展望国际移民治理的未来走向。

① 段成荣、邱玉鼎:《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南方人口》2023年第2期。

② 刘云刚、陈跃:《19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动态特征》,《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宋全成、熊方洲:《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变动研究——基于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社会学比较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④ Frank N.Pieke, “Immigrant China”, *Modern China*, vol.38, no.1 (2012), pp.40–77.

⑤ 马晓燕:《世界城市建设中移民聚居区的出现及其特征体现——基于北京市望京“韩国城”的调研》,《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⑥ 马晓燕:《移民社区的多元文化冲突与和谐——北京市望京“韩国城”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⑦ 周雯婷、刘云刚:《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地理研究》2015年第11期。

⑧ 李志刚、杜枫:《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人文地理》2012年第6期。

⑨ 许涛:《在华非洲商人的双层叠加关系格局及其渗透与转化——广州地区非洲商人社会交往关系的再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⑩ 周大鸣:《我国边境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21年第5期。

二、国际移民来华的原因及其多样化特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华国际移民的数量经历了两个明显变化的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华国际移民规模较小,改革开放前在华的国际移民人数仅有5.4万人。^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来华国际移民数量逐渐上升,至2020年累计有84.57万人。^②

(一) 国际移民来华的多重动因分析

国际移民的产生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理论涵盖了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地理环境、社会传统等多个维度。莱文斯坦(E.G. Ravenstein)将其概括为“推拉”理论,“推力”指的是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排斥因素;而“拉力”则指移入地所具备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吸引因素。^③

1.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企业积极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机遇,并在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逐步成为外国企业投资的热点之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成为国际人口流动的关键枢纽。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专业技能的外籍高端人才随着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的进驻而流入中国。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就业和商务活动,这些国际移民多数在外资企业或跨国机构中担任技术或管理职务。^④

除了引进外资企业,中国还重视引进外国人才,先后发布了《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1983)》《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2008)》,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外国人入境方面引入签证制度,不断简化出入境手续、扩大开放地区,放宽国际移民居留管理政策。如1985年发布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1996年《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2012年《出境入境管理条例》,2016年《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国际移民来华、在华提供了便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的国际移民数量持续增长,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逐渐成为国际移民在华的主要聚集地,涌现出一批日韩、欧美、非裔等族裔社区。

2. 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与移民个体的理性选择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指出,国际移民的决定因素在于个人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当预期移民后的收益显著超过为移民所承担的代价时,移民行为便可能发生。^⑤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提升了收入水平,这是吸引国际移民来华的主要经济动因。

以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员工为例,从日本公司总部派遣到上海的日籍工作人员,他们平均月收入约为2.8万元。除了工资收入,日资企业还为员工提供了全面的福利体系,涵盖租房补贴、医疗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等多项福利。这些福利使得员工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待遇远超过他们来华之前。^⑥

① 段成荣、邱玉鼎:《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南方人口》2023年第2期。

② 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2020年6月10日。

③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④ 刘云刚、陈跃:《19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动态特征》,《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Sjaastad L. 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0, no.5(1962), pp.80-93.

⑥ 周雯婷、刘云刚:《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的现状与问题——以在沪日本人为例》,《世界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

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对普通劳工群体的需求。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从市场结构的演变角度探讨了国际移民起源问题。Piore指出,现代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双重劳动力市场结构,其中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入、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职位,而下层市场则提供相反的条件。由于本地劳动力通常不愿意接受下层市场的职位,因此这些国家需要依赖外国移民来填补这些职位空缺。^①

虽然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但劳动力分布不均衡。改革开放后,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更发达的区域,这导致广西、云南本地的企业出现用工短缺的情况。如广西崇左每年甘蔗砍运季节,全市缺工6万人以上。^②这就给与广西接壤的越南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越南劳工在广西边境主要从事体力型工作,如砍甘蔗或进入木场、木板场、食品加工厂等做工。

在城市的家政劳工领域,中国也同样存在着劳动力缺口问题。自2000年起,中国城市家庭对高品质家政服务的需求持续高涨,然而,国内家政服务人员的供应及其服务质量往往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存在2000万人左右的缺口。^③这也给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家政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中国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而且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例如,2007年,云南省文山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678元,而边境一侧越南的边民月收入仅为18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约90元。^④菲佣在中国大陆的月薪普遍超过6000元,这一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她们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收入。工资差异是外国劳工选择移民至中国的主要驱动力。

3. 地理临近与迁移通道形成

国际人口迁移是由经济差异所决定,并由低成本交通、全球便捷通信和移民网络的建立所推动。^⑤1990年以来,东南亚国家来华移民猛增,其中以缅甸、越南和菲律宾上升的幅度最为迅猛。

西南地区国际移民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云南紧邻越南和缅甸,该省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优质的就业机会,吸引了邻国的移民前来云南寻求就业和定居。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四川、重庆和贵州的经济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愈发频繁,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在西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对华国际贸易。这为在华国际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此外,边境地区有许多专门针对跨国婚姻介绍的机构,婚介逐渐成为跨国婚姻形成的重要媒介。^⑥仅就中越跨国婚姻而言,截至2013年底,由婚介者介绍到中国并合法登记的越南新娘约有4.7万人,无证越南新娘的数量据说有6.5万之多。^⑦

(二) 在华国际移民的多样化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国际贸易亦呈现繁荣景象。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仅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同样庞大。来华国际移民类型多样,整体呈现多样化特征。

① Piore M. J.,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critics should let paradigm evolve", *Monthly Labor Review*, vol. 106, no.4 (1983), pp.26–28.

② 周大鸣:《广西凭祥跨境越南劳工的形成与特征》,《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

③ 《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已达3000万人》,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1/content_5643972.htm, 2021年10月21日。

④ 王晓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

⑤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p.108.

⑥ 杨国才、施玉桥:《边境跨国婚姻的研究与展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⑦ 武艳华、陈海萍:《无利不谋: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

1. 来源国家多样化,以亚洲周边国家为主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在华的国际移民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韩国、美国、日本、缅甸、越南的移民数量位居前五。而到了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国际移民的来源国已增至180多个,其中缅甸、越南、韩国、美国、日本的移民数量位列前五。对比两次普查的数据,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数量和占比均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36.5万上升至2020年的61.79万。^①其中,缅甸、越南移民人数增加最多。

2. 迁移动机多样化,以来华就业为主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国际移民来华动机依次是商务、就业、学习、定居、探亲五大类型。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国际移民来华动机以就业为目标的占52%以上。^②来华动机的变化,反映了来华国际移民身份的变化与新特点。

上海的国际移民主要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该群体主要是出于商务动机来华。从移民类型来看,在沪的国际移民人口主要由外资企业员工、外国专家等组成,他们通常携带家属在华居住。他们普遍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良好的经济条件,属于“高技术移民”和“跨国精英”移民群体。^③

义乌的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这个群体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他们的身份以商人为主,来华主要出于商务目的。

广东的国际移民人数最多,类型比较多样化,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外派员工、外国专家,也有从事中非贸易的非洲小商人,以及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非法劳工群体。

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东南亚移民的增速最快。在华东南亚移民可以分成三大类型:一是合法劳工群体。通过正规渠道来中国的东南亚劳工,主要在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工作。^④此外,还有一部分东南亚人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从事演艺、餐饮和教育培训行业,例如在各大城市五星级酒店从事表演的菲律宾籍演艺人员。二是非法劳工群体。通过非正规渠道来到中国的东南亚劳工,分散在中国西南边境省份以及经济发达省份的工厂、农场以及城市新富家庭务工。例如,2016年我国境内有约20万无证就业的菲律宾劳工^⑤,大部分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从事家政工作。三是跨国婚姻移民群体。这一群体不仅与中国西南边境省份的广西、云南居民联姻,还与沿海、内陆省份的居民结为夫妻,散居在中国各省份的农村地区。^⑥

3. 空间分布多样化,呈多点扩散

从空间分布来看,国际移民在中国的分布格局经历了显著变化。根据六普、七普数据分析,2010年国际移民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和福建省。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广东省、云南省、上海市、福建省和北京市。由此可见,国际移民在2010年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地区,2020年转变为华南、华东以及西南地区的多点扩散。

国际移民在华的空间分布主要在沿海经济带多点嵌入,广州、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

^① 宋全成、熊方洲:《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变动研究——基于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社会学比较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② 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2022年6月10日。

^③ 吕红艳、郭定平:《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基于上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④ 梁茂春、陈文、梁晓晨:《跨国迁移、流动与身份认同:中越边境的调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8页。

^⑤ 王雷、刘宏斌:《我国内地外来人员及移民流入的社会风险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⑥ 周大鸣:《我国边境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21年第5期。

区域是国际移民主要聚集地,各种高层次移民、劳工移民、非法移民散点嵌入其中。西南边境则主要吸引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他们或合法在指定区域就业,或非法频繁流动寻求务工机会,游离于移民管理边缘。

虽然分布广泛,但国际移民在华融入程度不高。以广州为例,2019年对广州市国际移民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国际移民长期居留中国的意愿普遍较低。^① 在上海市居住登记的国际移民有16.4万人^②,但在沪的日本人、韩国人均有独立且封闭的社交圈,较少与本地人、本地文化交流^③,社会融入程度较低。

在云南、广西边境就业的东南亚劳工移民,有的通过劳务派遣或企业招聘,在中国特定区域工作、生活;有的工人沿边界线在边境村落内务工、生活,或是分散在口岸城镇社区务工,属于季节性务工。他们在当地的居留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主要是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循环流动,流动性较强。^④

4. 非法滞留多样化,部分隐匿于城乡家庭

“三非”外国人治理一直是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的重点工作内容。2021—2023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每年查处“三非”外国人人数均在6.5万以上。^⑤ 然而,非法国际移民仍然屡禁不止。非法移民由于其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特征,在华的日常活动十分隐蔽,但其分布又极为广泛。来自东南亚的家政劳工及跨国婚姻女性移民,分别以就业与通婚的方式进入中国城乡家庭,政府部门难以掌握其行踪。

以家政劳工移民为例。2000年以来,在华的涉外家政从业人员数量大幅上升,菲佣、印佣、泰佣等数量迅速增长。她们主要在经济发达城市和地区就业,人员构成复杂,活动轨迹隐蔽。我国公安机关时常开展清理“三非”外国人的专项行动,外佣是公安机关重点排查对象之一。但由于外佣人员分布广泛,藏匿于雇主家中,且东南亚地区的外佣体貌特征与中国人差异不大,相关部门难以对其进行追踪管理。

以东南亚新娘群体为例。关于东南亚新娘的数量难以准确估计,据越南学者的研究,自1998年至2006年间,有超过4.7万越南女性嫁入中国。如果再加上来自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女性,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规模预计超过15万。^⑥ 2000年以来,跨国婚姻已由边境地区向内陆省份扩散。^⑦ 政府的估计远远低于实际婚姻的数量,事实婚姻和登记婚姻的比例约为5:1。^⑧

三、在华国际移民多样性社会风险的生成与表现

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率增加和范围扩大,人为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国际移民流入可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和稳定等方面造成不确定性和潜在的负面后果。

① 谭一洛、鲍智康:《广州外国居民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地理研究》2024年第9期。

②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八号)》,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8.html,2021年5月11日。

③ 刘云刚、谭宇文、周雯婷:《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地理学报》2010年第10期。

④ 王越平、杨天:《差异性嵌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外籍务工人员的空间特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⑤ 国家移民管理局,<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67/c1632812/content.html>,2024年1月18日。

⑥ 郑进:《我国内陆山区中越跨国婚姻家庭形塑机制研究——以大别山区红安、大悟两县为例》,《人口与社会》2018年第5期。

⑦ 李娟、龙耀:《中越边民跨国婚姻法律问题探析》,《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⑧ 尹靓:《江城县边民跨境婚姻治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财经大学,2017年。

(一) 国际移民社会风险的形成逻辑

一方面,在华国际移民社会风险产生的核心因素在于移民数量的急剧增长、群体的多样性以及高度的流动性,部分移民在华形成了移民小社会,还有部分移民进入中国城乡家庭等私人领域。国际移民的多样化增加了国际移民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际移民的治理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若管理不善,国际移民问题可能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

国际移民流入所带来的风险是全球化进程中所有开放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其生成逻辑可以概括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移民数量将急剧增加。国际移民群体的多元化、复杂性和高度流动性,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显著的不确定性影响。在累积效应的影响下,国际移民问题有可能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如果政府管理部门未能有效应对或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国际移民风险问题可能会蔓延至其他领域,甚至升级为政治问题。因此,国际移民流入的风险既源于移民群体的多样性,也与其潜在的扩散性风险紧密相关。有效的社会治理归根结底是对社会风险的预防和化解,因此,设计合理的移民管理制度对于化解国际移民流入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至关重要。

(二) 国际移民引发的社会风险与后果

无论是合法的国际移民,还是非法居留的国际移民,他们在华的日常活动均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风险。

1. 国际移民的聚集可能引发文化冲突的风险

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上海的日韩人、义乌的中东人和广州的非洲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移民小社会”。^① 国际移民在华长期居留,却在华建构起自给自足的族裔聚集区,发展出具有显著族群特色的熟人网络、宗教团体、社会组织等,形成不同的族裔社会网络。广州的非洲社群内部拥有健全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互助组织和社团,他们定期组织并参与宗教活动。非洲人与中国人的互动主要限于商业领域,学习汉语的兴趣较低。^② 这种族裔聚集区有利于国际移民初来乍到的社会适应,却不利于来华新移民与中国社会的交流互动。随着这种外来移民小社会的逐渐形成,国际移民与本土社群的隔阂也在不断加深,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2. 非法移民流入引发民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信任流失的风险

伴随着大量外国移民进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例如,根据中国法律,外籍人士仅能在“国内暂缺合适人选,且有特殊需求”的领域工作。然而,目前在中国,无证居住和无证工作的外籍人士现象相当普遍。^③ “三非”移民、“三非”问题以及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持续增加,给地方管理带来了挑战。^④ 非法移民的流入可能会削弱我国对人口的管理能力,对国家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引发民众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质疑与不信任,其潜在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例如,我国部分地区的地下外佣市场十分活跃,在经济发达、高端家政需求量大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介绍菲佣、缅甸女佣、印度尼西亚女佣的中介服务机构。^⑤ 非法印度尼西亚女佣可能涉及跨国犯罪甚至包括恐怖活动,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⑥ “三非”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对外佣中介和非法移民的监管体系。如未能有效应对,将影响民众对政

^① 吕红艳、郭定平:《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基于上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② 李亚枝、刘立欣:《昼伏夜出——广州非洲人的社会适应策略》,《热带地理》2021年第4期。

^③ 李明欢:《当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及主要国家的政策应对》,《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

^④ 吕红艳、郭定平:《全面构建外来移民治理体系》,《国家治理》2018年第1期。

^⑤ 张杰:《从“菲佣”现象透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国人就业管理问题》,《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⑥ 潘玥、罗津:《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在华印度尼西亚女佣及其治理》,《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2期。

府管理能力的信任水平。

3. 非法跨国婚姻移民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婚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中国男性形成婚姻关系的东南亚女性不断增加,该群体被称为“东南亚新娘”。

从历史来看,东南亚新娘并非新现象。长期以来,在中越、中缅接壤的边境线上,边民因族源相同、语言和文化习俗相近,往来和通婚现象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跨国婚姻一度被视为政治敏感问题,跨国婚姻数量较少。1979年,民政部开始为中国大陆居民提供“涉外婚姻”登记服务,这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承认跨国婚姻的合法性。^①

然而,由于涉外婚姻的登记需要外方人士提供有效护照或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以及所在国公证机构或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证明,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大多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无法依据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婚姻登记,与中国男性结成的是“非法跨国婚姻关系”。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非法跨国婚姻中的东南亚新娘不能取得中国国籍,无法获得中国社会福利与合法就业权利,加上跨文化适应障碍、语言沟通不畅,通常会走向婚姻家庭解体。^②

还有部分东南亚女性以相亲或结婚为由向中国男子索要巨额彩礼,骗婚逃婚现象频发。由于非法跨国婚姻中介的推波助澜,中国大龄农村男性成为他们的目标客户。有的越南女性多次与不同中国男性通婚,进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③

除了婚姻关系不稳定,非法的东南亚新娘还将影响子女的成长。东南亚新娘逃跑率高,她们所生育的子女易成为单亲家庭子女,容易在成长过程中滋生叛逆心理。跨国婚姻家庭的多重弱势身份是导致子女既受到社会分层下的结构性排斥,又产生自我边缘心理,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易陷入“局外人”的边缘状态。^④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成员模糊身份和模糊意识的生成甚至蔓延。^⑤由于近年来东南亚新娘分布空间不断扩散,跨国婚姻家庭子女人数也不断增加,未来应关注这一群体的健康成长,降低潜在的社会风险。^⑥

此外,由于缺少社会监督以及合规的健康体检,一些东南亚女性携带病毒入境,易引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如云南省入境通婚人员中,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比例高达20%,导致边境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难度极大,易产生病毒传播风险。^⑦福建龙岩对境外新娘的体检,传染病的检出率高达1.76%。^⑧

四、韧性治理：国际移民风险管理的新路径

国际移民吸引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国际移民的本质是人员国际流动,与其

① 蔡圣晗:《我国跨境婚姻的历史寻径与现实审视》,《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3期。

② 刘中一:《东南亚新娘现状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王鑫:《浙江经济欠发达地区非法婚姻移民问题探究——以越南新娘为例》,《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④ 蒋立松、程紫嫣:《边缘困境与渴望融入:中越跨境婚姻子女在学校交往中的身份重构》,《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7期。

⑤ 周建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以广西大新县壮村个案为例》,《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⑥ 龙耀:《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S1期。

⑦ 保跃平:《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⑧ 翁里、俞珊珊:《论涉外婚姻中的外籍人员管理》,《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他市场要素的国际流动密不可分,涉及跨国迁徙各个环节,需要制定系统的国际移民发展规划,加强国际移民的总体布局、工作思路和实践路径的顶层设计,系统和长远地考虑如何发挥国际移民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韧性治理在防范和应对风险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以及日益显著的结构性风险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①中国必须构建一个具备韧性特质的治理体系,以应对国际移民人口结构日趋复杂化的趋势,并化解国际移民流入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具体实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构建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国际移民管理信息平台

在国际移民流动性极高的背景下,构建一个结构化的数据库体系,涵盖在华国际移民基本信息库、行为轨迹数据库、社会交往数据库等,显得至关重要。我国当前的国际移民管理更侧重入境前的审核程序,而对移民入境后的监管则相对忽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应当强化对国际移民的登记和监管工作,确保数据采集的规范化以及数据核实的准确性,从而提高整体管理的精确度。在此基础上,要推进数据整合,建立全国联网的、各部门共享的国际移民信息管理系统,从而使对国际移民的管理更精准、更到位。

(二) 建立具有韧性的移民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国际移民是一个频繁流动的群体,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可能是快速变化的。因此,要对国际移民群体进行有效治理,必须进行系统的风险识别、评估与快速应对。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适度借鉴他国经验,构建韧性国际移民治理体系。

具有韧性特征的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是以符合我国国情与国家利益的移民管理法律体系为基础的。它应该能服务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能够有效预防和化解国际移民给国内带来的社会风险,并且能有效应对非法移民的流入与风险。^②因此,必须强化移民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构建与全面规划,尽早拟定移民法典,以提升移民规范体系的权威性。重视法律在移民管理中的应用,通过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改变目前以低层次规范性文件为主的现状,提升移民法律规范体系的权威性。同时,加强对低层次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防止规范之间的冲突,确保移民法制的统一性。^③

(三) 实施国际移民精细化分类管理

近年来我国的“三非”国际移民数量持续上升,给我国的国际移民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一现象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外国人无视我国的移民管理法律制度,同时也与我国国际移民分类体系过于宽泛不无关系。

鉴于我国的国情以及来华国际移民的多样性趋势,未来我们应尝试有条件、有限制地接纳部分非常规移民,并探索拓宽常规移民渠道的可能性。例如,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非法就业的外籍家政人员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移民管理部门。根据我国现行的引进外籍人员就业政策,这一群体并不符合“高端人才”的标准。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民众消费观念的改变,我国家政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特别是随着多胎生育政策的实施,对高质量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更是急剧增加。如果能够有条件地放开外籍家政工人来华工作,不仅能够满足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还能更高效地管理国际移民流动。^④

此外,还有两类当前被视为“三非”的国际移民可以有条件地被接纳,这两类移民为:非法就业的留学生,以及那些在中国长期生活、融入当地环境、结婚生子且不愿返回原籍国的外国妇女。对于第

① 易承志、龙翠红:《风险社会、韧性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文杂志》2022年第12期。

② 熊文钊:《论中国移民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建构》,《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熊文钊:《论中国移民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建构》,《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

④ 叶氢:《走向有序统一:三非外国人治理研究》,《政法学刊》2011年第2期。

一类非常规移民,可以通过调整法律政策、放宽就业限制来解决,促进留学生在中国就业。对于第二类非法移民,出于维护其子女利益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如果社会评估表明她们不构成社会危害,可以考虑赋予她们合法身份。

(四) 大外管工作格局与涉外警务治理能力的提升

我国的国际移民来自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非”移民主要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和西南边境地区。当前针对国际移民的管控立法滞后,处罚标准过低,部门间缺乏有效相互支持,存在国际移民管理盲区。例如,当前的非法移民遣送法律自相矛盾,没有独立的遣送费用,遣送效果不佳;一线涉外民警能力参差不齐,基层严重缺乏小语种人才。^① 移民管理部门存在的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国际移民的治理。社会治理工作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因此,未来要继续理顺移民管理部门的“条块”关系,注重涉外警务人员的培养,建立高标准的涉外管理队伍,以有效应对国际移民治理需求。一方面,明确各机构在涉外管理中的职责,构建一个协作机制来处理涉外案件和事件,从而形成一个由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专业管理、派出所的基础管理以及相关警种的配合管理共同构成的全警种参与的涉外管控工作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管队伍的优化建设,组织涉外管理人员的全员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工具使用和方法手段的应用,明确管理标准和外事工作纪律,规范盘问语言和外事执法规程,从而提高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增强管理工作的效能。^②

针对非法移民问题,应当实施专门的整治措施。对于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和单位,应予以罚款,并在严重情况下将其列入“黑名单”。对于非法来华务工的人员,应采取解雇和遣返等手段。同时,对于非法偷渡入境的移民,必须予以坚决打击。而对于合法的国际移民,应采取更加灵活和差异化的管理策略,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对于国际移民在华可能出现的社会状况要有充分有效的处理方案,既要做好服务,也要做好管理。^③

五、总结与展望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的流动始终处于高度变化之中。对于我国来说,当国家继续对外开放、经济持续发展、就业机会充分,国际移民的持续流入就不可避免。基于当前国际移民在华呈现的来源地多样化、迁移动机多样化、迁移方式多样化、空间分布多点扩散的新特征,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公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信任流失、跨国婚姻不稳定性、公共卫生等风险,亟需构建一个既系统化又具有灵活性的治理体系。

韧性治理关注整个过程,能够增强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抵御风险冲击、降低风险影响,适应国际移民群体的新变化。国际移民韧性治理着重明确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权责界限,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基层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强调对社会风险的快速和有效响应,以实现治理系统的动态平衡与自我调节。韧性的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合法国际移民融入中国社会,对在华务工国际移民和婚姻移民进行精准分类,并严厉打击“三非”移民。这有助于减少国际移民流入风险的影响范围和冲击力,推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提升我国的国际移民治理能力,实现多方共赢。

[责任编辑:黄 石]

① 宋全成:《非法外国移民在中国的现状、症结与对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② 江栋、傅军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华外国人管理的探索与思考——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的实践为例》,《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③ 段成荣、邱玉鼎:《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南方人口》2023年第2期。

elements for the initia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 review, an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raft laws after they have been approved and come into effec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voic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Committee in the review process, clarify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raft laws, and highlight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raft laws.

Key words: draft law;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legislative process; Constitution and Law Committee

Role Deviationin Two Medical Models: Socio-Psychological Insights into Doctor–Patient Tensions

Chen Lijun, Wang Ruosi, Wang Xin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he medical model is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ealth and disease. Following the theological medical mode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medical model and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he image of the doctor's role it portrays influences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s of doctors. Western medicine has undergon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ultimately forming a medical model mainly based on biomedicine, where doctors play the role of experts in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op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wo medical models challenge the idealized role of doctors. When there arises a disparity between a patient's perception of a doctor's role and the doctor's positioning within a given medical paradigm, it often fosters tension and conflict with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Key words: medical culture; medical model; role deviati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lience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China

Chen Feng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With the opening up of Chinese society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influx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has shown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diverse places of origin,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predominating; diverse motivations for migration, with employment in China being the primary reason; diverse spatial distribution, spreading across multiple points; and diverse situations of illegal immigrants' overstaying, with some of them hiding in urban and rural famili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ay trigger potential social risks,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migrant sub-societies leading to cultural conflict risks, illegal immigration causing a decline in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leading to marital instability and public health safety risks. To address these risks, a resilient immigration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both systematic and flexible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reduce the scope and impact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influx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enhance China's cap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overn-

ance,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all parties involv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nts; migrant diversity; social risks; resilient governance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Web Novels and Their IP Adoption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ased on Sentiment Analyses:
A Case Study of *Heaven Official's Blessing***

Ruan Shi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he spread of Chinese lightnovel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world-class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their IP adaptations are increasingly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extual data mining, the English comments of the popular webnovel *Heaven Official's Blessing* (*Tianguan cifu*) and its animation on the world's largest online book recommendation site Goodreads and the world anime review site MyAnimeList are collected and divided into five dimensions: translation, national image, literature, animation-making and interaction with derivative works. Quantitative sentiment analyses and qualitativ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ment data reveal that the novel and its IP adaptations are well received in the English world in a benign interactive ecology. This owes to the smooth translation, dramatic story, vivid characters and the Eastern fantastic xianxia background as well as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that appeal greatly to the English receivers. The negative comments concentrate on the information overload in the English subtitles, the infidelity of certain episodes to the original and the slow pace due caused by editing. Translation quality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than the animation, and the anima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the audience's mind through multiple modes.

Key words: sentiment analysis; book review; audience comment; IP adaptation; webnovel; translation acceptance